

爱情的

译海丛书

旋 涡



花城出版社

外国爱情小说集

# 爱情的漩涡

研茲啓新聲

《译海》编辑部选编 1989

花城出版社

译海丛书

**爱情的漩涡**

《译海》编辑部选编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70,000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300册

书号 10261·774 定价 1.50元

“啊，我亲爱的，我只能带给您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您还有力气继续向前跑吗？”

她微笑了：“直到天涯海角。”

——引自《拿破仑遗恨》

目  
录

主讲人〔日〕 ..... 轴鼎(丁)

齐 舟

歌 莱·赫尔夏〔英〕 ..... 银瓶沽醋爱(3A)

李 玉 乘

瓦 芬 直·圣·封夏〔法〕 ..... 财聚令姬拿(DI)

齐 瑞·李

大 黑 鼠〔荷〕 ..... (本词谱) 恋蝶(202)

齐 夏 咏

降 啸 真·旗墨西〔兰乐章〕 ..... 丁去歌出娘(222)

齐 正 乱 搞

• 爱情的漩涡 •

# 目 录

- (1) 北岬 ..... [日] 迂邦生  
林伊玲 译
- (37) 爱情的漩涡 ..... [英] 夏洛特·莱姆  
康 庄 译
- (141) 拿破仑遗恨 ..... [法] 夏娃·圣·伯努瓦  
李 强 译
- (205) 初恋(缩写本) ..... [俄] 屠格涅夫  
苏 戈 译
- (255) 他出海去了 ..... [爱尔兰] 西墨斯·奥凯利  
郑启五 译

· 乐游出版社 ·

直德炳太，鋪將更印入板書丁並登，趁新稿正出她體。  
晏午舞。晏雖頭髮火燄裏知丈，鋪照量照日。丁生融音懷  
**北岬** [日]辻邦生  
林伊玲譯

象北岬一样，  
经受着八方怒潮的拍击……

——索福克勒斯《奥狄浦斯在科洛诺斯》

我初次见到玛丽·特丽萨，是在从巴黎回日本的邮船上。那天清晨，船通过苏伊士运河，驶进了酷热的红海。整个上午，我是在凉爽的食堂里度过的。过堂风在那里呼呼地吹着，我机械地埋头翻译着文艺复兴时期某宗教家的著作。那是一本大部头的作品。碰到难点时，我就从圆圆的船窗向外眺望，欣赏着与蓝天相接的碧波和从浪花中飞出的鱼儿。然而，当这种消遣仍不能帮助我解决难点时，我也只好暂时跳过难点往前译了。

下午，食堂变成了酒店。不当班的船员们都聚集到这里喝酒、打牌。这时，我就到前头甲板的背荫处躺下，倾听风打缆索的声音，凝视着向桅杆聚集的乱云；或向船头走去，伫立在呼啸的海风中。船头拥起簇簇浪花，向前猛进。巨大的白色船身，使我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沿东洋航道进行航海

探险的英雄。

船驶出了红海海域，经亚丁湾进入印度洋时，太阳就直射在船上。日照最烈时，皮肤象被火灼似的难受。我于是回到船舱，边喝啤酒，边读着希侬的著作。

一天清晨，我站在被夜风和浪花打湿了的前甲板上，一边喝咖啡，一边嚼夹着干酪的黄油面包。海面还未全亮，风夹杂着露，凉嗖嗖的，使我感到这已不是红海的风了。

我喜欢象航海者那样，站在甲板上，迎着猛烈的海风，吃着咖啡送奶酪面包的早餐。尽管这种做法显得有点原始、侠义、粗野。

平时，吃完早饭后，我总是拿着原著、笔记本、笔、几本参考书和字典到船舱里去。可是，那天早晨，我却登上了窄窄的阶梯，绕过盖着罩布的船具，走到了上层甲板上。在最上方，有一个供驾驶员观望的船桥。我向它走去，想看看红海的远景。但是，当我绕过卷着起重机钢绳的绞车，并扶着绞车准备上去时，忽然发现了在绞车的背荫处坐着一个修女，她两手扶额俯身贴在甲板上。我本想不理她就到船桥上去的，但忽然又想到：她是不是晕船了，正难受着吧？船从马赛港开出来才四天，她可能还不大熟悉周围的人，晕了船独自跑这儿来了吧？

这么想着，我就把已踏上阶梯的脚步挪下来，走到修女的身旁，“您身体不舒服么？”听到我的问话，她直起了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文静、温柔的年轻修女。她的脸泛起了红晕。

“不，我不是不舒服。我，我是在作晨祷啊。”

她的话使我窘困不已。

“这太失礼了，”我狼狈地说，“影响您做晨祷了，真对

不起。”

“不要紧的，我非常高兴能得到您这样的关心。”  
她正襟危坐在甲板上，闪忽着灰蓝色的眼睛说：“您是回日本的吧？我也到日本去。”

后来我知道她的名字叫玛丽·特丽萨，瑞士人，曾一度到过日本。她说，这次是第二次去，准备在那里呆上十年或更长一些。她说她看见我整个上午在食堂埋头写东西，还问我写什么。我告诉她，我在翻译一本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其中讲到的自由选择精神对现在的我很重要。

玛丽·特丽萨把一直说着的法语突然改成了日语。  
“我这次要更好地掌握日语。我一定能看懂您译的那本著作，我要好好地欣赏它。”

我们说了几句话后便分手了。我登上了船桥，看见穿梭跳跃的鱼群被行驶的船惊得向别处跳跃，越过几个浪峰，渐渐远去。我重新下到上层甲板上，看见玛丽还在那里。她和刚才一样，两手放在额前贴在地上，俯身坐着。

渐渐地，我和这个年轻、恬静的修女熟识起来。每天下午，我不到甲板上睡觉了，而是和玛丽在一起度过。

最初，我们的话题极平常，谈的不过是些兄弟姐妹的事情、自己居住的土地和对旅游区的印象，还谈了朋友、工作以及自己所喜爱的书。玛丽·特丽萨穿着一身灰色的长僧尼服，头发用同种灰色的布扎在后面。她的胸前挂着十字架，但身上佩带的东西除了这个十字架和装在右口袋的一串念珠外别无它物。

她不是和熟人谈话，就是坐在甲板的背荫处，戴着太阳镜看书。我猜想她读的多半是拉丁文的祈祷书。

旅客们大都疲于长途旅行，不是赌博，就是在甲板上玩耍或者懒散地睡大觉。在这些人的衬托下，这位年轻修女不显眼的举止使我看到了人类的高尚品格。即使已过了红海，进入印度洋，炎热还是一点没减。

“在这种环境下您还能这么平静地读书。”

我站在一边，将喝完的啤酒罐远远地掷入了海中。它在船头被白色的浪花淹没，又卷出来，然后摇摇晃晃地流向船尾。

“我也有吃不消的时候啊，”她摘下太阳镜，眯着眼睛说。“然而，不论是在怎样艰苦的地方和干什么艰苦的工作，承受这些困难不正是我们的义务吗？我们的教团就是这样在工作中为人类效力的。我坚信这是唯一的神圣之道。”

我从她那里还听到许多她们教派的特殊生活方式。她说：“本教派的使命是：出入于世界上最不幸的地方，承担最困难的工作。特别是深入非洲、新几内亚等地开展医疗活动。然而，我们中有不少人自己也病倒了。”

我体会不出玛丽话中的真实感。我认为这个小小的教派不过是将修女派往世界各地的组织而已。换句话说，修女们到远东和太平洋诸岛去撒开救济之网，而网索却被教团中央紧紧拉着，——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的这个猜想被推翻，是在船到达科伦坡港的时候。我嫌上街游逛麻烦，于是躺在船舱里，一手拿着啤酒罐，一手拿着希依的著作在读。偶尔，我还朝圆窗外面扫几眼，看着那些沿舷边挂着的绳梯爬上爬下的港口工人。在人群中，还有拿水果吆喝着，要换香烟的人。

这样，过了两、三个小时。我听到有人在轻轻敲门。打

开门，玛丽·特丽萨站在门外。

“您不上街吗？”

她的一双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快活，头发被一条灰色的布向后绑着，脸蛋显得很有生气、很美。

“我上次去逛过了，这次就不打算去了。”

“我们教派里也有人在这里工作，如果您不感到为难，就跟我一块去看看她们吧。”

如果说，我什么时候对玛丽有特殊感情，那就是此刻看到她那被晒黑了的皮肤和快活表情的时候。

我们坐着小舢舨来到港口，坐上了等在仓库背荫处的出租车。车开出了港口，驶进了明亮的、两旁排列着一排排小矮房的街道。马路很宽，浓绿的街树展示着它们的粗枝，枝上密密的树叶里开着许多散发着浓香的花朵。过了主要街道，就进入了红褐色的干燥土路。只要汽车一过，这条路便尘土飞扬。但是，不管走到哪里，都长着很多常绿的树木。

眼前出现了一座象市场一样的建筑物，人山人海，非常热闹。虽然还是上午时分，但日照已相当强了，市场前的广场被烤得火辣辣的。那些忍耐力相当强的露天商贩在广场上贩卖着瓜果、蔬菜、鸟儿和家禽。

我们在这闹市的一条胡同下了车，然后又走过几条胡同。灰色的大树把树枝伸到了胡同的深处，青藤缭绕的篱笆倒塌了；下水沟里的脏水溢了出来；孩子们蹲在树荫下。剃光头的和尚们身着黄褐色僧服，排着队从小寺院出来。在寺前的石龛里，有一朵蜡制似的热带大花在散发着浓烈的香味。这朵花不带茎叶，只有厚厚的花瓣被置在微笑着的石佛前。

我被引到了一个围着茶红色土墙的民家。一进门坎就是

个大间，外面的光线悄悄地照进了昏暗的屋子，圆桌腿和中国式扶手椅在泛着漆光。地上敷着象硬石板似的东西。修女们的凉鞋的硬后跟在它们上面走过时发出“咯咯”的响声。

出来迎接玛丽的修女身穿同样的灰色尼服，眼睛炯炯有神，面庞轮廓分明，皮肤微黑。她刚出来时，我想她肯定是斯里兰卡修女，但是，当她和玛丽说起话时，我才听出那是一口真正法国人说的法语。听到了她们说的法语，我才得以比较出玛丽那一口笨拙的瑞士式法语。

斯里兰卡修女把饮料拿来后，这座显出民家风尚的建筑物便又安静下来了。

“我也听说了您要到日本去的消息，”肤色浅黑的修女说，“这回可在那里呆长一点了吧，祝愿您工作顺利。”

“谢谢。我这次准备呆上十年或更……”玛丽说。

“您是个安得下心的姑娘，日语又学得不错，工作一定能顺利。”

“您在这里已有十……”

“对，十五年了，”肤色浅黑的修女低下眼睑，用沉思的口吻说。“十五年了。我几乎认为自己已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了。这里确实也发生过不少变化。那年政变，死了很多，有几次我们都差点遇难。一开始我可没能象您那样安心工作。这里的酷暑、地方病、贫困、无知一个一个地向我压来。我当时真以为自己抵挡不住了。我整天在医院里忙碌，挨家挨户地去探望病人，去帮做活计，帮着哄孩子。当一天完了时，我们疲惫不堪，陷入了完全的空虚中。这难道就是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全部贡献给人类吗？也许是吧。但是，我渐渐觉得自己象个活玩偶似的在虚无中工作。我当时把自己叫

做：穿着修道服的活玩偶。那也许是我觉得最痛苦的时期。但我还是在空虚中坚持下来了。我把自己仅有的微不足道的力量献给了所有需要我的地方。我就是这样，以活玩偶的姿态出现，使出了自己所有的力量，一直干到现在。令人不解的是，我在这自我牺牲的工作中不知什么时候发现了自然和充实的自己。换句话说，这个自我是属于已经定了型而不易为世事所动的东西。从那时起，我渐渐也和别人一样安下了心。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我都想念那恬静的克勒尔门，那是我的故乡。我多么怀念那里的群山，那里被秋日映红的古教堂，还有那座用火山岩石垒成的石屋啊。而这个只有夏季的常绿国度，只有酷暑和贫困、疾病和无知。当这种抱怨情绪向我袭来时，我时常到港口去。港口内停泊着许多船只，船的周围有很多鱼漫游着浮出水面。它们灰红色的肤肌在阳光映照下反射出光泽。说句实话，我经常跑到那里哭。我长时间地站在仓库的背荫处，看着三色旗飘扬在港内的船只上。”

听了这段叙述，我简直不能相信眼前这个目光锐利、看上去意志坚强的修女还有这么一个时期。

我们来时在路上曾遇到一群身穿白色学生服的女学生和她们的领队老师。我谈了我对师生们干净、文雅的印象。那位修女听了我的话后说：“是历史把一切改变了。这改变多么令人高兴啊！”但是她又说，还有许多悲惨的东西被掩盖着，而这些东西都非得留居在这里才能看得见的。

在那隐寓似的清凉小屋呆了约莫一点钟左右，我们就告别出来了。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到佛教美术馆去了一趟，还去游览了郊外的动物园。看到玛丽在鹦鹉、猴子面前天真无邪地拿食物逗它们，我不禁暗下思忖：她为什么要去当教律如此

严格的教团的修道女？这是个多么可怕而不合理的矛盾啊！可能是为了航海旅行的缘故吧，她那晒得微黑的肤色显得没有一点脂粉气。除了胸前佩带的十字架和腰上挂着的念珠外，她没有任何装饰品。但她脸上泛着红晕，闪忽着一双明亮的眼睛。逗鹦鹉说话时她那不顾一切的神情又分明表明她不过是个普通的姑娘。真不明白是什么精神使她走上了这条严酷的道路。既然她能离开富裕的家庭，到遥远的异国去，还勇敢地过着孤独的生活，那就一定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吧？即使是这样，当我看到眼前这个拍着手高兴地笑着的玛丽时，我心里便升起一股无名火，对严酷地束缚她的教律感到忿恨：连那位貌似坚强能干的修女也要经历过那么痛苦的岁月，更何况这个稚气未退的玛丽·特丽萨哩。她为什么不能带着她可爱的孩子和孩子们一起给猴子喂食，尽情地大笑呢？这不是比身穿囚服般的修道服更合她的秉性吗？

在归途的出租汽车里，我想着这些事情，没心思和玛丽说话。她也不在乎这些，只是回忆着刚才那些滑稽的塘鹅和色泽鲜艳的鸟儿，不断发出痴笑声。她还不停地说着自己对佛像的印象。

热带香花围绕着的佛像与日本的佛像相比有着不同的情趣。这确实使我产生异国情调的美好的幻想。然而，越是这样，我就越想在落英缤纷中把年轻的玛丽当作一个普通的姑娘向往。在她稳重的举止中，我感到了一种年轻女性所特有的华丽而甘美的气息。尽管这样，我却没往她的脚踝子上看过去一眼。

船开进了新加坡港口。为了避免和玛丽在一起，船停稳以后我便上了岸，到街上去游逛。我非常担心，当看到伏在

甲板上长久地做着祷告的她时，我心中燃起的微不足道的思念之情会搅乱她的思绪。诚然，我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是自然而健康的，但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她所肩负的使命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我就想悄悄地使自己平静下来。在到达新加坡的前几天，船在马六甲海峡上行驶。我和她站在船的右舷上，观看苏门答腊岛那平坦而狭长的灰蓝色姿影。当我们谈起“天职”这个话题时，我很自然地问到她为什么要去当修女的问题。

“那是我从小就有的抱负，而且这个愿望到我长大了还未曾改变。所以我就进了修道院。”

“那么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严酷的宗教呢？助贫治病并不是你们的工作，而是政府和官员们的事情。”

她紧锁眉头，目视着远方。好一会儿，才带着严肃的表情说：

“事实也如此。杜绝贫困、疾病和无知也许是政府的事情，但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参与这项工作。对于这事情，我们不能只看它的效果，而应该考虑它所体现的人生的意义。”

她的表情还是那么严峻。

我静静地听着她说话，对她的责任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敬意。我稍稍离开她几步，凝视着她身穿灰色修道服的身姿。我敢肯定这样看她更为合适。

在新加坡时，我适当地疏远了玛丽。但当船驶近了西贡港时，我又出于一种奇妙的矛盾心理，想再次和玛丽一起上岸去拜访她所属的那个小教派的同僚们。我这个欲望也许是来自一种苛刻的心理：想发现隐藏在她们心灵深处的人类的懦弱。

船进入印度洋后，行驶得很平稳。除了天气炎热外，一切都安然如常。特别是从新加坡海到南中国海这段海域，波涛推动着一些浮在水面上的圆圆的、绿绿的东西；一群群淡紫色的海蜇象沉入水中的睡莲一样摇摇摆摆地游动着；海豚群以可笑的速度，沿着船边，又沉又浮地紧跟着船。我远眺着在水平线上行驶的为数众多的帆船，愉快地听着我们的船与别的船互相招呼的汽笛。

船驶到湄公河口时，水流之急犹如洪水泛滥平原。沿河泛舟的少女头戴斗笠，一排排水上人家以及宽阔的水田，都清楚地表明了这里的气候、水土是东亚雨季式的。

下午，船一靠岸，玛丽就来找我了。她每次要外出，都掩饰不住充满青春活力的兴奋，这次也一样。

我以前曾漫无目标地逛过西贡的街道。所以这次打算弄清楚法国统治时期修建的潇洒的林荫道、中央公园和市场大致在什么地方。但是，玛丽却领我走到了离闹市区很远的杂乱无章的地方。在那里，有几条小河的河水象水沟似的在流动，周围是一排排临时搭起的房子。小路的尽头有些男人半裸着身体，坐在树荫下赌博。孩子们在到处乱跑。年轻的妇女们肩挑着木桶和一些很重的东西，在拥挤的人群中干活。她们藏在斗笠下的脸庞挂满了晶莹的汗珠。吵架似地又快又短促的越南语从各种货店和人群中传出。我们离开那段地方，穿过露天市场，走上了一条小径。在露天市场的后面有个贫民窟，那些干瘦的老人和病人蹲在没有门扇的昏暗小屋里，有气无力地半睁着眼睛，看着我们从他们面前通过。

玛丽进了一间离小径不远的屋子。屋门前一块有限的空地上有三株相间很密的棕榈树。屋内的垫高地板有水上人家

的风格。太阳照到院子里的每个角落。屋子没有门扇，墙壁是用竹子编成的。这使我感到它某些地方很象南太平洋岛屿上的诊疗所。

上了高高的阶梯，就可见到整间屋子被分成了四部分。第一间是起居兼接客室，第二间是寝室，后面的一间是内客厅和餐厅，但它们被一道屏风隔开了。只有厨房是设在后院。

我们一进屋，看到一位法国修女躺在床上休息。她脸色苍白而憔悴，眼窝深深地陷了进去，只有眼珠子在热情地放着光彩。我们劝她继续休息，她说什么也不依。屋里还有两位越南修女。见我们来了，她们就操着带越南语口音的法语，流畅地说要去把安东尼娅喊来。玛丽说，不着急，我们的船准备在此地停泊两天，今天见不到她，明天来也行。

修女们互相介绍了身旁的同事后，就把话题转到了在这个地区的工作情况上。她们主要是在医院工作，有时也到附近的金属加工厂去帮助加工金属元件。她们虽没有象斯里兰卡的修女那样直接倾诉苦衷，但她们苍白的脸色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外的黑眼圈告诉我，她们承受着令人恐惧的重压。

这小屋和斯里兰卡的小屋一样，摆设很简朴。唯一不同的是桌子、椅子和墙上挂着的照片。总之，室内的布置使人感到这是法国人的居处。想起刚才在路上见到的阴郁昏暗的小屋，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压抑感。这或许是在嫉妒修女们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还能保持自己的情趣吧。

我们正说着，外面响起了脚步声。突然有个修女向玛丽奔来，“啊，玛丽·特丽萨，真想念你啊！”两人长时间地拥抱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注意到我的存在，向我伸过手来。我发现她的手被油染黑了，手指受了伤，缠着绷带，外

面套了个胶皮套。据说她（安东尼娅）来西贡已快两年了。被太阳晒黑的脸色很憔悴。与其说她是修女，不如说她象巴黎商业区那些长着一副秀气脸庞却干着裁缝的女工。事实上也是，当她一开口，说出来的便是一口流利的巴黎式法语。

“现在，工厂的劳动条件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只有柱子和屋顶。工人们象牲畜似地一个接一个进了厂。炎热、尘埃加上不卫生，劳动效率极低。而且，到处都在说法国的坏话。那都是些让人难以置信的话啊：‘法国的文明在哪里？那不过是表现在把西贡的街道按法国人的情趣装饰起来！’法国人把我们的财富偷得一干二净。把无知和疾病置之不管，却运走了我们的财富，这就是文明吗？”夜里，我常在梦中听到这些话，而不得不捂着耳朵，把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然而，这些话确实是从当地人的嘴里说出来的。这是最低级的文明！这是把无知和贫困当作代价的臃肿文明……”

奠边府（注：一九五四年法军在印度支那战争中大败之地）战役离现在时间还不算太长，所以街上的警官以及邮局的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还说着法语。

“这简直难以让人相信！一方面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漫骂来帮助他们的人，把帮助他们的人当作敌人！”

一位修女带着制止的神色喊着安东尼娅的名字。她马上闭口不言了。这时，一个越南修女用器皿装着切成圆片的水果走了过来。

“玛丽，你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失败吗？”一阵沉默后，安东尼娅把水果送进嘴里说。“即使自己面前的战斗暂时失败了，你是否还有信心认为我们的事业会胜利？”